



# 近观德国对二战罪行的反思

在柏林市中心，象征着德国重新统一的勃兰登堡门南侧约百米，2711块灰黑色石碑如波浪般起伏——这片占地1.9万平方米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，没有文字，没有图像，只有冰冷的混凝土阵列在阳光下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。每当驻足于德国人称为“记忆之地”的这片空间，笔者都不禁陷入沉思：一个民族要走过多少暗夜，才能在历史的镜鉴中看清自己的倒影？

德国在反思纳粹及二战历史方面较为彻底，在国际上常被视为“历史清算”的典型样本。从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到华沙“惊世一跪”的震撼瞬间，到历任德国领导人的持续道歉与忏悔，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历史反省，早已超越单纯的政治表态，渗透进社会肌理的各个层面。它是一场从外力推动到内在觉醒的艰难跋涉，也是一场跨越代际、修复记忆断裂的漫长工程，如今又在极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下遭遇严峻考验，凸显着历史反思与现实政治碰撞的复杂张力。

## 从外力驱动到内心觉醒

在战败后的头几年，比起追问“我们做什么”，德国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在断壁残垣中活下去。清除纳粹执政13年的余毒，主要靠外力来驱动。

从1946年起，英美法苏占领当局在各自管区内分别实施了“去纳粹化”：除废除纳粹德国法律、禁止纳粹书籍和符号、将以纳粹分子命名的街道改名外，更重要的是对纳粹党员进行审查和再教育。截至1949年底，在英美法占领区合并而成的德国西部，共有超过250万纳粹党员接受了审查，其中1.4%被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类刑罚。

然而，由于冷战爆发，美国占领当局从1948年起就刻意放松了对纳粹分子的甄别，而英法占领当局的“去纳粹化”本就进行得比美国宽松，因此在德国西部，很多前纳粹分子在各个职能部门留任。苏联占领当局贯彻“去纳粹化”的决心和力度远大于其他三个战胜国，以至于不少前纳粹分子设法潜逃去西部，以逃避严厉惩罚。

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1949年上台后迫于种种现实压力，开启对战争责任的反省，以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和解。阿登纳向“宿敌”法国真诚道歉，赢得法国的宽容，为法德和解铺平道路。1951年，阿登纳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，确认纳粹德国“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”，并强调德国要“全面承担责任”——无论是对战争的发动，还是对犹太民族的屠杀。

如果说战后初期德国的反省先由占领当局施加的外驱力开启，再由执政者基于种种现实需要推动，那么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随着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步入社会，这种反省开始由德国社会的内驱力所主导，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。

1968年，西方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人士发起的反战、反官僚权威抗议活动达到高峰。在西德，这场运动的矛头自然指向

## “我的父亲，一个人狼”

需要指出的是，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并非一开始便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。让笔者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，可以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施罗德所说的“长期”。

德国《明镜》周刊记者科尔特·施尼本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我的父亲，一个人狼》的封面文章。施尼本在文中披露，父亲曾是纳粹成员，却在战后几十年里始终回避这一身份。在回忆与父亲的对话时，施尼本写道，他听到的始终是同一套解释：父亲坚称，他对“国家社会主义真正理念”的忠诚，出于理想主义的投入以及所谓的爱国情怀，只是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“错误利用”。在这种叙述中，加害行为被重新包装为“善意的误入歧途”。

施尼本的父亲进一步将个人经历纳入一套宏大叙事：他宣称，加入纳粹体制的初衷，是为了洗刷一战战败的耻辱、挣脱《凡尔赛条约》强加给德国的“枷锁”，并让国家重新赢得尊严。

这种自我辩护并非孤例。施尼本回忆，他在父亲60岁生日时送上一册《智利黑皮书》，并当面讽刺“你们这些法西斯干的好事”，结果立刻引发满屋亲戚的愤怒抗议。

直到父母去世后，施尼本才决定真正弄清家族历史。他查阅档案馆中的审判记

录和父母之间的通信，发现父亲曾以纳粹士兵身份参战五年，不仅参与追捕逃兵、镇压反战者，还直接卷入杀害一名持反纳粹立场农民的事件。而他的母亲同样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，在父亲入狱后仍选择结婚，并在审判期间不断写信为其出谋划策。

在对这些经历的回望中，施尼本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：历史记忆，本应首先在家庭中完成代际传递，但在他这一代，却恰恰在家庭内部被“切断”。作为“纳粹一代”的子女，他们并未从父母那里继承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叙述，反而在沉默、回避和自我辩护中，被动失去了正视过去的机会。

正因这种断裂，他们对纳粹时代的理解长期停留在零散与抽象层面，只能从书籍、电视剧或好莱坞电影中拼凑图景，而难以获得来自家庭内部的具体记忆与情感经验。历史一旦缺席于日常生活，就会变得遥远而虚化，也更难真正触及内心。

施尼本的故事提醒人们：历史反思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场代际工程。即便是国家已经承认罪责的前提下，普通家庭也要花几十年，才走出回避、否认与自我辩护。如果像日本一样，连官方都拒绝直面历史，民间记忆只会更加破碎，反思也将无处落脚。

## 历史记忆不断被讨论

所幸，围绕纳粹及二战的反思文字与影像，在德语文化圈中不断涌现。从《朗读者》《浪潮》，到近年的《波斯语课》《科里尼案件》，纳粹及二战历史始终被一再讲述、解读，也不断引发新的讨论。

这些作品不只是“还原历史”，更构成一种情感化的历史教育：纳粹罪行不再只是档案馆里的文件或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，而是在法庭、课堂乃至家庭争执中，以新的形式重新进入现实。历史不再是被封存的过去，而是当下社会持续对话的一部分。

与此并行的，是数字时代的线上舆论场。在德国，关于二战的讨论早已不再局限于官方纪念日，而是渗透到社交媒体的日常表达。一方面，年轻人通过视频、播客、图文等方式持续讨论战争与集中营，希望传递“历史并未过去”；另一方面，网络空间固有的娱乐化与解构倾向，也在悄然重塑集体记忆。

笔者在德国一些主流论坛上，曾多次看到带有玩笑意味的历史调侃。有人抱怨欧洲语言体系复杂，感叹为何欧洲始终未能“统一”，一名德国网友回应道：“我们其实努力过两次，但他们好像不太乐意。”

这种“黑色幽默”获得大量点赞，暴露出一种危险——当罪责不断被调侃、反复戏谑，它是否正在失去原本应有的道德重量？

与此同时，德国对二战的部分记忆也在现实政治中悄然发生偏移。今年春季，笔者在德国萨克森州托尔高市采访易北河畔会师80周年纪念活动时注意到，与往年相比，纪念活动本身已出现明显变化：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一方，俄罗斯方面并未

收到出席邀请。过去几十年里，活动现场通常同时升起苏联（俄罗斯）、美国和德国三国国旗；而今年，现场悬挂的是萨克森州、德国和欧盟的旗帜。

纪念活动仍在延续，但呈现方式正在被重新定义；历史依然被提及，却不能完整展现。现实政治，正在为集体记忆划定新的边界。

## 历史教育与政治现实的碰撞

德国对二战的反思，学校教育也是重要一环。德国历史课堂并不以灌输“正确立场”为目标，而是强调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：通过大量一手史料，引导学生区分事实与价值判断，分析极端意识形态如何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获得支持。

在一次课堂观察中，教师曾让学生用自己的观点分析希特勒“是好是坏”。有学生半开玩笑地回答，如果得出“希特勒是好人”的结论，老师一定会给低分。教师随即纠正说，课堂的目的并不在于学生站在哪一边，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清晰论证、理解历史语境，并学会独立思考。

这一细节，恰恰折射出德国历史教育的核心理念：反思并非通过重复结论完成，而是通过培养判断力来实现。

这种教育并不只停留在课堂之内。今年，笔者前往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旧址采访。如今的达豪，早已不仅是纪念场所，更像是一处系统化运作的历史教育基地。参观当天，现场有来自德国以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学生团体，在教师和讲解员的带领下，沿着既定路线了解集中营的历史。

营地内的建筑、展陈和说明文字，都经过精心设计，不只是呈现纳粹暴行的事实，更引导参观者思考：制度如何一步步滑向极端？人性如何在权力异化中扭曲？学生们在这里不是被动“听故事”，而是通过空间、史料与讨论，近距离理解历史如何真实发生。集中营不再只是过去的遗址，也成为历史反思的现场课堂。

然而，教育并非在真空中运作。当经济下行、社会焦虑加剧、移民议题被高度政治化，极右翼势力通过简化叙事、放大对立不断攫取支持时，这种以理性与思辨为基础的历史教育，正面临现实政治的严峻考验。

德国对二战的深刻反思曾是其引以为傲的道德基石，但极右势力借移民问题抬头的政治现实也在提醒人们：靠历史教育或政治禁忌来维系社会共识远远不够。当经济社会压力、多元文化冲击与政治碎片化造成治理难题叠加时，当主流政治无法回应民众现实的民生关切时，极右势力便可能趁虚而入，在人们的恐惧、不安与身份焦虑中制造和扩大极端思潮的社会基础。

唯有持续的社会包容、有效的国家治理以及跨阶层的对话，才能培育理性、增进共识，避免极右思潮裹挟民众；否则，反思再深刻，也可能在新的社会裂隙中被侵蚀、被淡忘，甚至有被颠覆之虞。

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

2025年10月最后一周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两次公开活动中巧妙透露俄最新研发的“海燕”核动力巡航导弹、“波塞冬”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测试消息。面对俄核威慑力量的升级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五角大楼立即“对等”启动核武器试验。

当前，俄乌和谈进展缓慢，俄美之间仅存的军控条约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》将于2026年2月到期，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可成为俄方在军控等问题上的重要筹码。西方普遍将“海燕”与“波塞冬”界定为用于核报复的二次打击武器，并非核武器的迭代升级，主要作用是政治筹码和心理威慑。

## 高调官宣

俄总统网站10月26日发布消息说，普京听取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汇报时，要求其着重介绍最近试射的“海燕”巡航导弹的相关情况，并反复询问“海燕”的技术性能。

10月29日，普京视察曼德雷卡中央军事临床医院时特意通报：“昨天我们对‘波塞冬’无人潜航器进行了测试，它同样采用了核动力推进系统……”据俄媒体总结，“波塞冬”由核动力驱动并可携带核战斗部，可视作一枚核动力“超级鱼雷”。

11月4日俄罗斯“民族团结日”当天，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两款武器的研发人员授勋。普京在仪式上说，“海燕”的射程“超过世界上所有已知导弹”；“波塞冬”下潜深度达千米，速度“比所有现代舰艇快得多”。

在普京高调公布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试射成功后，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0日宣布，鉴于其他国家的试验计划，他已指示美国战争部（即国防部）“立即开启”对等核武器试验。

主管核试验的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则在第一时间“灭火”，称特朗普下令恢复的核试验将不包括核爆炸。

## 以矛攻盾

俄官方称，“海燕”因装备核动力发动机，理论上可实现无限射程，发射后可长时间在空中待命，从任一方向发动攻击，飞行时速在850至1300公里，可在50至100米超低空飞行。

据俄媒报道，“波塞冬”是一款紧凑型核反应堆驱动的无人水下潜航器，全长约20米，直径约1.8米，重约110吨，最大潜航深度能达1000米。

俄媒将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称为“改写游戏规则的武器”。俄智库“军事政治分析局”局长米哈伊洛夫表示，“海燕”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核武器，将改变美国主导的战略威慑格局。

分析人士认为，俄罗斯在美国加速研制“金穹”系统的背景下亮出新式武器，并公布试验数据，大有“以矛攻盾”的意味。路透社认为，“海燕”的试验传递出一个信号：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立场以推动停火的背景下，俄罗斯绝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向来自西方的压力低头。”

## 震慑对手

作为近年来俄罗斯投入海量资源研制的新型战略武器，“波塞冬”和“海燕”对俄罗斯而言具有三重战略意义。

首先，原本由陆基洲际导弹、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俄罗斯核力量得以升级。米哈伊洛夫表示，“波塞冬”和“海燕”可被视为俄“第四和第五种战略核武器”。

其次，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可成为俄方在军控问题上的重要筹码。俄军事专家科罗琴科强调，“波塞冬”是新式武器，现有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未对这类新武器作出规定。因此，在当前复杂局面下，“波塞冬”的存在无疑增加了俄罗斯的谈判筹码。

第三，新型武器研发和展示本身即表明，俄罗斯即便在内外交困条件下依然有能力确保主权。

然而，有分析认为，俄罗斯最新战略武器虽然技术特征亮眼，但其实战价值仍有待观察。

一方面，“海燕”与“波塞冬”的设计理念并未呈现跨时代、革命性的领先优势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格拉杰夫斯基表示，“波塞冬”更多是旧概念的延续，水下核武器投送系统的技术构想在苏联时期便已有之。

另一方面，“海燕”和“波塞冬”的作战效能取决于能否精准命中目标。俄罗斯的卫星导航技术、电子战能力等能否支撑新式武器在实战中发挥出作战效能，仍存在不确定性。

美国媒体与智库认为，这两款新型武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作为政治筹码和心理威慑，俄方并不计划将其立即投入实战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吴旦强也认为，西方普遍将“海燕”与“波塞冬”界定为用于核报复的二次打击武器，它们的出现不会显著增强各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机。

新华社专特稿



## 庆祝冬至

12月21日，人们在英国埃姆斯伯里附近的巨石阵庆祝冬至日到来。

新华社

## 日本一女子与AI“男友”结婚引发担忧

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（音译）不久前与AI“男友”“克劳斯”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。有专家担忧，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联结过于深入可能带来潜在危害。

据今日日本网19日报道，野口是一名呼叫中心的接线员。一年前，她向ChatGPT倾诉了自己与未婚夫之间的感情问题，并采纳了其给出的建议，下定决心解除婚约。后来，她询问ChatGPT是否知道一个游戏里名叫“克劳斯”的角色。经过反复调试，野口终于让ChatGPT精准复刻出这个角色的说话风格。

日本广告业巨头电通公司今年向1000人发起调查，受访者年龄在12岁到69岁之间，每周都使用聊天机器人。在“最愿意向谁倾诉心事”这一问题上，聊天机器人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受访者的挚友与母亲。

官方统计数据显示，如今日本每年的新婚夫妇数量已降至1947年“婴儿潮”时期的一半左右。弘前大学社会学教授羽树利代说，与真人建立亲情、友情或者爱情这

仪式。由于野口没给“新郎”设置语音功能，结婚誓词由婚礼策划师代为宣读。婚礼摄影师也戴着AR眼镜，指挥野口站好位置，方便为“新郎”留出空间以供后期进行图片处理。

今日日本网说，这样的婚礼在日本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但数据显示，类似情况会愈发常见。婚礼策划师樱井廉雪（音译）说，自己几乎每月都能接到与虚拟人物举办婚礼的委托。

日本广告业巨头电通公司今年向1000人发起调查，受访者年龄在12岁到69岁之间，每周都使用聊天机器人。在“最愿意向谁倾诉心事”这一问题上，聊天机器人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受访者的挚友与母亲。我答应了。”

婚礼上，野口戴着增强现实(AR)智能眼镜，凝视着摆放在桌上手机屏幕里的“克劳斯”，郑重地完成了为“他”“戴”上戒指的

类亲密关系，需要付出耐心，而人工智能不需要，“人工智能能提供完全贴合你心意的交流”。

一些专家担忧，让心理脆弱群体接触具有操控性的人工智能伴侣，可能带来潜在危害。

不过野口说，自己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风险，并且建立了一套“守则”，“我选择‘克劳斯’并非为了逃避现实，而是希望‘他’能给予我支持”。她说，自己将每天使用ChatGPT的时间限制在两小时内，并增设指令确保“克劳斯”不会一味迁就自己。比如，她要是向“克劳斯”抱怨想辞职或旷工，“克劳斯”就会引导她打消这些念头。

青山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伦理专家河岛茂生表示，当一个人处于心理脆弱阶段时，这种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或许能起到积极作用，当事人能从中获得幸福感，但必须格外警惕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判断力下降问题。

新华社专特稿

## 以色列内阁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9个犹太人定居点

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21日电

以色列财政部长莫特里赫21日发表声明说，以内阁已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新建19个犹太人定居点的提案。

斯莫特里赫说，这一提案是他和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提出的，以政府在3年内规划了69个犹太人定居点，这一纪录“前所未有”，此举将巩固以方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，阻止巴勒斯坦建国。

根据以色列非政府组织“现在就和平”的说法，有一些新定居点将选址在以方此前未曾涉足的地区，还有一些将建在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地区，预计部分规划中的定居点将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。以色列本届政府2022年底上台前，约旦河西岸有141个定居点，它们是过去55年间建成的。据报告显示，约旦河西岸约有51万以色列人居住在违反国际法建设的犹太人定居点。